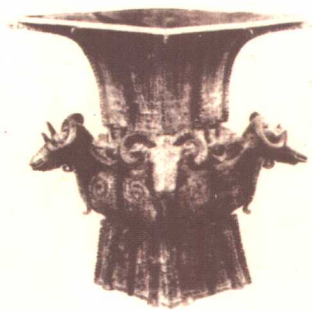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王
桧
林
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

事与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桧林卷:事与势/王桧林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11-02083-2

I.当... II.王... III.①社会科学—文集②王桧林—文集③中国—现代史—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75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桧林卷

中国现代史:事与势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180.00 元
(共十册)

“丛书”总序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靦然送人，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这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和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科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过电。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禀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後四日，京東亮馬河畔水南齋

自序

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意，感谢陈铁健先生的热心张罗，这本自选集得以出版了。按出版社的要求可以写一篇书序，我也愿意借此机会说一说想说的话。

收入书中的文章多数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和现代思想史的，而又偏重于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和史实内在含蕴的探索方面的；其他方面如与历史事实关系较少的纯理论性的、关于历史教育的、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限于篇幅没有收入。

我认为写一篇论文（关于通俗宣传的和一般应酬性的文章除外），不论长短，都必须有新意新内容，不然，对作者自己和读者（如果有读者的话）都是一种时间和精神的浪费。当然一篇文章内容全是新的很难做到，但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中国现代史（按通行的说法指1919~1949年的历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1949年以后才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有些历史学者认为这段历史还未成为历史而是时事。这种情况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来说既不利又有利，不利的是没有或极少研究成果可以凭借，有利的是它是一片未开垦的广阔天地，一个人

的研究能力在这里可以尽量发挥。那时论述一个新问题提出一种新意见不是什么难事。但这门学科又有其它历史科学分支所没有的局限性。为政治服务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大学课堂上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作为政治课开设的，目的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因此，讲课要和中共中央文件、党报党刊社论、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对口径”（“对口径”那时是很流行的话，现在没人说了）。这些就限制了人们思维能力的发挥和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去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提出有创见的意见、发掘与现在结论不合的论断，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允许的。同时，过去长期盛行的“大批判”之风，这也使学术界的某些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养成盲从的习气。那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做历史研究是困难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研究当然不会例外。而中国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异乎寻常的快，这种变化到现在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个变化的历史。这样，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本身也经常处在变化之中，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两大变化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对全国的领导地位，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学术上定为一尊。二是经过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共否定了“三面红旗”和“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人真正开眼看世界，发现了全球的大变化，新思潮新时尚急剧涌入。这二者是划时代的事件。这种大变化极大极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实和前途，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实质和面

貌。毫无疑问自己也处在被影响之中。但是在大局之下仍保持着自己的思想特点，就是注意实事求是，喜欢独立思考，不那么轻易地随风倒，因此在“大批判”的年代不断地（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批判为“右倾”、“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在那个“大批判”成风“一边倒”盛行的年代所写的东西，仍有一些在事后看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毫不奇怪，有不少说法和想法是错误的。那时还流行着一种不良的文风，不知叫什么好暂名之曰“大批判式的文风”。这种文风对自己也有影响，以后逐步改正。1978年以后所写的文章，其中的某些观点，隔一段时间再看，也有不正确的。这在入选的文章中可以看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术界盛行这样一种风气：1949年后出版此前的著作、文章、文艺作品的时候，作大量增删修改。如果是只作文字上的改动是未尝不可的，但不是如此，而往往是对作品的思想观点作与以前发表时不同的原则性的改动，有的是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过去文章中没有的东西加进去，而且不加任何说明，删节的地方也不标删节符号。这就搅乱了历史的真实，给研究者造成极大的麻烦，甚至由此相信了错误的史实，得出了错误的论断。可喜的是，这种事情现在少了。还有一种情况，把以前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时候，不注写作年月和发表的出处。如果那些文章还值得研究和有参考价值的话，这也会给研究者使用者带来麻烦。一种意见，在若干年前可能是极难得的创见，若干年后就成了普通常识了。年月不清容易造成史实上的混乱。以上这种情况，我认为应当纠正和改变。这个意见体现在这本自选集中。

在学术界不正之风盛行的年代，也写过少数错误的文章，有的是奉命而写，有的是出于自己的认识。这种文章此集中没有收入。这不是想隐蔽错误，而是：一为集子的字数所限；二怕引起

误会，怕有人说：你是否还以为那些东西是正确的呢？有错误的思想写过错误的文章，在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是抹不掉的，对此不应当隐讳而是应该重视。对过去那段中国历史的反思，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对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是有极大好处的，对提高一个人的学术境界是有极大好处的。

为了有助于了解文章的内容，也为了提供一些史学界的情况，下面对集子中的某些文章作一些说明：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总序》。《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本计划出多种，只出了三本。丛书总序先由三位丛书主编各提出一份初稿，然后综合在一起，写成一份正式的序。此文是我提供的一个初稿。稿子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汇入正式出版的丛书总序中，丛书总序的有些观点也与我的意见不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断革命论问题》。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和王真先生等写过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文章，宣传“大跃进”思想。“大跃进”受挫后，对此进行了反思，收集了较多的材料，基本上搞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瞿秋白的“一次革命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写出了手稿。1981年3月按手稿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办的党史教师进修班上讲过课。课后按讲稿整理成此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把此稿印成打印本，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间交流和发行。

《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此文是为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所写的一篇论文，当时印了铅印本。论文所作的阐述似乎以前还未见。其中有些看法以后改变了，或有所发展。我没有参加会，文章也未公开发表。

《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这是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此文和上一文有一部分重复。两文写作的时间相差10年，我对问题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文章对民主思想的演变作了一种新的考察，受到某些史学界同仁的重视。此文曾在《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发表，发表时由杂志编辑作了删节。

《关于王希天思想与活动的三个问题》。此文是针对下列问题而写的：（1）王希天参加并领导五四前的学生运动、从事侨日华工的工作，是由于他突破了基督教思想（他是虔诚的教徒）的局限才做到的。（2）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前后发动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把基督教教会团体作为反革命来攻击。文章通过对王希天这个具体人物的研究，指出上面的看法和做法是错误的。

《如何评价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这篇论文是我和郭大钧合写的。我们在撰写《中国现代史》一书时，郭大钧发现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把这次会议看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在一次中国现代革命史学术讨论会上郭大钧阐述了他的看法，引起了争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发表了不同意我们的意见的文章之后，让我们写文章参加讨论。这样就写了这篇文章。

《评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兼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上的几个问题》。论文第2部分对问题的看法是郭大钧首先提出来的，故此文发表时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文章是我一个人写的。文章对当时流行的几种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钱玄同年谱·序》。此序对学术界（主要是文学界）普遍流行的对钱玄同的某些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反应》。此文中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部分，曾作为一篇独立的论文，题为《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提交1989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会后收入《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论文集）一书中。编入《中国通史》时作了一些修改。文章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作了深层的考察，揭示了某些底细问题，这里举出三点：（1）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进攻有时作比较积极的抵抗，但随后又和日方签订妥协退让的局部性协定。何故？原来这就是蒋介石自己说的“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完全相应一贯”的策略。（2）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为什么既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又大讲“三天亡国”。他的用意在于用一种曲折的说法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3）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概括为“‘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此文是向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文章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重新评价，提出了与普遍公认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文章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文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上发表，发表时由杂志编辑作了大量删减。日文译文发表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74—3号上，1987年11月出版。《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文中提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的复兴时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之一。抗日战争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的机运。这个问题早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的《抗日战争丛书》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其后作过多次阐述。现在似乎被公认，成了一种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这是1963年9月写成的一份手稿并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过。此文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政策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文章使用了不少以前从未用过的原始资料。在此要感谢杨凡先生。当时杨凡在我们教研室作资料员，他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翻译了一部分日本对华政策的文献资料，曾印过一个小本子向国内高校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机构散发。我利用了这些资料。今天看来文章所述，有些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似乎还有参考价值。40年前还没有这样的研究和论述的文章。

文章的编排，大体上以其内容涉及的时间之先后为序。总括性的文章放在前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一文，带有这一历史时期的总结的性质，放在最后。

任何一篇论文，任何一本著作，其学术价值如何，只能由学术界的公意去认定。衷心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教！

2002年2月11日（旧历除夕）

目 录

丛书总序	1
自序	1
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绪论	1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总序	3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断革命论问题	39
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91
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	115
关于王希天思想与活动的三个问题	137
如何评价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 (与郭大钧合写)	148
评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兼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167

《钱玄同年谱》序	187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反应	197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13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整体格局	230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	245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269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	297
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	312
解放战争初期的三种建国主张	320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程 ——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	369

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绪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的指导思想。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那个时期，任何一种政治都没有起到过它那样大的作用。对这个政治理论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完备，它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终止，它的体系和内涵，都是本书应该研究的内容，并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尽可能地展开深入的论述。这个任务分别由各个章节去承担。

但是任何一种重要的政治理论学说，都是符合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般规律的，它的产生和能够发挥作用是有着广阔的基础和深刻的根源的。这些往往是更具有必然性的东西，更能说明事物本质的东西。因此，在各章节展开具体论述以前，先从一般人类思想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史基本状况同这个理论的关系方面，作一些原则性的说明。

一、理论发展决定于现实的要求 ——发展理论的必要性与选择性

人类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是在人们的社会

实践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现实社会的要求。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在于它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政治理论、政治学说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在于它能满足人们政治上的要求。归根到底，与人类社会无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现实的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理论学说思想体系一经产生之后，它不是扮演一种点缀的可有可无的消极角色，而是起着一种干预与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因为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他们的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是受理论指导的活动。所谓人类活动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他们的活动有理论作指导。理论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情况当然也是如此。

但是，人类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人类的政治活动是极为复杂的，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在每一个人类社会大变动时期，往往不只产生一种政治学说，而是多种政治学说政治理论纷然并陈。在近代中国，由西方传来的政治方面的西学不止一种，中国人或接受或排拒，反应多种多样，这就呈现出一种纷然并存的局面。这样，哪一种学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由社会现实经过人的自觉的不自觉的行为去选择。这样，必要性就与选择性联系在一起。同时并存的多种政治理论，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者得到发展，不符合时代要求者则有三种情况：一被自然淘汰，归于无声无息；二在斗争中被战胜、被取代；三在历史发展大流旁边保持其存在，但不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总起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理论对社会发展、政治需要的必要性与社会发展、政治需要对政治理论的选择性。

在近代中国的下半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被历史选